

綜論一九五零年代香港的知識難民

容啟聰

香港大學出版社策劃編輯

壹、前言：一九五零年代香港知識難民的緣起

一九四九年大陸政權易手，大批知識分子南下香港以免活在共產政權之下。這些初臨香港的知識分子，對當地的政治、社會與文化亦不甚認識，並視之為避難、暫居之地，盼望國民政府一旦反攻大陸成功便能北還。五十年代初南遷香港的知識分子所涵蓋的範圍相當廣泛，有大學者如錢穆和唐君毅等史學家和哲學家，有學富五車的政治人物如左舜生和李璜等中國青年黨領袖，也有新晉的熱血青年如余英時和許冠三等。知識分子本為受教育之人士，與大眾所認知的「難民」概念也許相差甚遠。然而他們抵港初期，大多盤纏不足，不一定有穩定的居所，亦只能靠從事文化教育事業過活。可是四十年代末香港的中文高等教育尚在起步階段，文化事業亦不甚蓬勃，知識分子亦只能勉強得以糊口。

幸而在當時的冷戰氛圍下，美國政府有意通過不同的非政府機構對這些在港的知識分子施以援手，希望他們能在文化戰線對抗共產主義。例如雅禮協會（Yale-in-China Association）和亞洲基金會（Asia Foundation）便資助了新亞書院的創立與發展（傅葆石，2019a：58）。亞洲基金會和美國新聞處（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更支持了友聯出版社的成立和《中國學生周報》的出版（傅葆石，2019b：67-74）。同時，為使流亡香港的知識分子能夠脫離貧困，使其才能得以發揮，美國國會議員周以德（Walter H. Judd）於一九五二年創立了「援助中國知識人士協會」（Aid Refugee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c.），並在香港設立分社，以幫助在香港的知識分子移居美國開展新生活（趙綺娜，1997：68-77）。「知識難民」即是 *refugee intellectual* 的意譯。正因為一九五零年代初很多在香港成立的文化、出版和教育機構皆有美國資金支持，學者

大都將這些文化產業稱之為「美元文化」或「美援文化」（王梅香，2015：1-51）。而「美元文化」亦使流亡知識分子得以在香港發展其文化和教育事業。

貳、知識難民在香港的活動

南來香港的知識分子能從事的工作並不多。他們既不能從事體力勞動的工作，亦沒有足夠的資金從事商業活動。故此，他們只能投身教育和文化事業。可是，當時受政府認可的大學只有以英語授課的香港大學。南來學者只能自己創立高等院校，如新亞書院和崇基學院等，去繼續其教育事業。因為這些院校所頒授的學位並未受政府承認，故不能稱之為「大學」，亦只能以「書院」或「學院」為名。

這些中文高等院校中最為人熟知的，便是新亞書院。書院的創立過程反映了當時南來學者的貧苦。一九四九年十月，錢穆、唐君毅和張丕介等學者創立了亞洲文商專科夜校。書院創校初期只借用一中學的教室在夜間上課，並在另一地方租用一樓層為學生宿舍。此宿舍亦為錢穆之居所（錢穆，1994：289-292）。一九五零年初，夜校得一商人資助，得以租用一大廈之兩樓層作為校舍，並轉為日校，改名新亞書院。一九五二年後，更得各美國機構如雅禮協會、美國亞洲協會和哈佛燕京學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等機構資助，穩定發展。一九五六年，書院獲美國福特基金會資助興建獨立校舍（周愛靈，2010：73-111）。自此，新亞書院為不少流亡學者提供發展教育事業的機會。著名學人如羅香林、余協中和劉百閔等均在新亞書院任教（新亞校史館，2021）。

與此同時，不少具政治背景的知識分子亦希望在香港繼續宣揚其政治理念，遂致力於出版報刊雜誌。他們既反對共產黨，亦反對國民黨，故自稱為「第三勢力」（Yang, 1992: 269-273）。他們在香港出版了不同的政治雜誌，介紹並傳播民主自由的內容與理想。這些刊物包括左舜生創辦的《自由陣線》和由張君勱遷至香港繼續出版的《再生》。因應兩岸政權皆為專制政府，這些在香港的知識分子提倡「民主政治」和「文化自由」。針對共產中國與蘇聯的結盟，他們則強調「國家獨立」，以示中國不應該附庸於別國之下。與臺灣的

自由主義者宣揚放任自由主義不同，他們主張實現民主社會主義和「公平經濟」，以示社會主義並不同於共產主義，實有其與自由民主相配合的地方（容啟聰，2018：236）。由於港英政府對各方的政治宣傳活動相對容忍，以維持其尊重言論自由的形象，不但國共兩黨的喉舌報刊能在香港出版，也提供了充分的自由予流亡香港的知識分子作政治和文化宣傳。雖然在一九五零年代初臺灣也有關注「公平經濟」的知識分子，如夏道平、殷海光和戴杜衡等，但他們卻受當時西方反烏托邦主義的冷戰氛圍所影響，很快便傾向於放任自由主義（何卓恩，2008：260–305；Yung, 2015: 152–157）。在此情況下，民主社會主義能在香港繼續發展實屬難能可貴。

「美元文化」亦幫助了知識難民在香港發展其文化事業。其中不能不提由亞洲基金會資助的友聯出版社。友聯出版社由《自由陣線》前編輯胡欣平和陳濯生創立，並出版多種有關中國政治、社會和文化的書籍。該社亦出版《中國學生周報》，以余德寬為督印人及首任總編輯，並招攬其他流亡青年如史誠之、徐東濱和邱然等加入編輯團隊（萬麗鵠，2001：30–33；盧瑋鑾，2014：18）。受《自由陣線》影響，友聯出版社和《中國學生周報》均以「民主政治」、「公平經濟」和「文化自由」為奮鬥理想（盧瑋鑾，2014：86）。為確保《中國學生周報》能順利出版，亞洲基金會每個月會提供約八千元港幣的財政援助，並使《中國學生周報》能以便宜的售價在學生之間廣泛流傳（傅葆石，2019b：70）。友聯出版社和《中國學生周報》的創立與出版，不但滿足了美國在香港開展「文化冷戰」的目的，更為當時流亡香港的年青知識難民，提供了工作機會得以謀生，為他們的文化事業打下了基礎。

在流亡香港的知識難民當中，不乏如青年黨人左舜生、李璜和謝澄平等屬於「第三勢力」的政治活躍分子。他們除了出版於《自由陣線》等報刊外，亦活躍於參與政治組織。在一九五零年代初，香港出現了不少熱衷於中國政治的組織，其中以「中國自由民主戰鬥同盟」最為活躍。「中國自由民主戰鬥同盟」，簡稱「戰盟」，由中國民主社會黨領袖張君勱、前行政院副院長顧孟餘和張發奎將軍於一九五二年創立，並受美國中央情報局資助，曾在沖繩島的軍事基地訓練游擊隊，以求通過軍事力量反攻大陸。「戰盟」的游擊隊曾在香

港的蒲台島出發，企圖在廣東沿岸登陸。可惜卻為香港水警截獲而失敗。此後「戰盟」卻陷於內部糾紛，繼而瓦解（張發奎，2008：487-508；黃克武，2020：255-260）。「戰盟」的運作時間雖短，卻代表了暫居香港的知識份子，如顧孟餘和前立法院長童冠賢等，不甘安於現狀，投身反共民主建國之事業。

參、知識難民對香港的影響

在一九五零年代，不同年齡、專業的知識難民移居香港，對當地不同範疇亦有相當方面的影響。教育方面，南下香港的知識分子紛紛建立了不同的高等院校如新亞書院和崇基學院。在一九五零年代香港只有一間以英語授課的香港大學的情況下，這些以中文授課的高等院校無疑為香港的學生提供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他們亦訓練了不少日後在學術界大放異彩的學者，如歷史學家余英時和哲學家霍韜晦等。這些南來學者所創辦的新亞書院、崇基學院和聯合書院，在一九六三年更合組成為香港中文大學，為香港中文中學的畢業生提供在本地升讀大學的途徑。

至於前述的友聯出版社及其附屬機構，更為香港的文化發展和學術研究帶來深遠的影響。「友聯」所出版的《中國學生周報》是一九五零至六零年代最為暢銷的學生刊物。其以南來青年為主體的編輯團隊亦出產了不少香港著名的文化人物。友聯出版社的創辦人胡欣平，不但在香港的高等院校當兼任講師，教授與中國文學相關的科目，亦不時在報章雜誌撰寫時評，成為香港著名的政論家。他更涉獵文化創作，出版過不少小說和散文，可說是知識難民出身當中比較成功的一位（胡王篆雅，2010：59-64）。《中國學生周報》其中一位督印人胡菊人，在六十年代末受香港《明報》創辦人查良鏞邀請，成為旗下政論刊物《明報月刊》的總編輯直至一九七九年。胡氏在一九八零年代離開《明報月刊》，創辦同類型刊物《百姓》雜誌，更在此後十數年成為香港其中一本重要的政論雜誌。及至一九九四年，因為「一九九七主權移交」臨近，胡菊人結束了《百姓》，並移居加拿大（盧瑋鑾，2014：215-233）。友聯出版社的另一位編輯許冠三，後來在香港不同高等院校如浸會書院和香港中文大學等講授歷史。他在六十年代末，更創辦《人物與思想》雜誌評論時政，直至一九七四年停刊，此後，許氏即專注於歷史教學（余英時，2018：138-139；何俊仁，

2010：8-9；盧瑋鑾，2014：13）。友聯出版社亦對香港的學術研究貢獻良多。其附屬機構「友聯研究所」成立於一九六二年，主要工作是搜羅中國大陸的各種報刊和資料並將其分類整理，以供外國學者使用。其所收藏的資料廣泛，涵蓋中國政治、社會、經濟、軍事、文化和教育各方面。在中國大陸處於對外封閉的狀態下，「友聯研究所」遂成為外國學者為研究中共政權所拜訪的重鎮之一（傅葆石，2019b：67）。

除了教育和文化發展，南來的知識分子還涉獵香港政治。前述的「第三勢力」在五十年代末逐漸消亡之時，部分居港的中國民主社會黨人開始關注香港政治。隸屬民社黨革新派的孫寶剛自五十年代末起即倡議推行憲政改革，在香港成立民主自治政府。他在一九六四年成立了香港社會民主黨，並對香港的各種社會民生事件發表意見，希望在香港宣揚社會民主主義。可惜當時香港人的政治意識並不高，香港社會民主黨並未被香港居民所重視。故此，相對教育和文化，南來知識分子對香港政治並沒有很大影響（容啟聰，2018：244-249）。

肆、知識難民的去向

南來香港的知識難民當中，部分選擇留在香港繼續發展其事業，亦有選擇離開香港前往海外生活者。前者包括在香港投身教育事業的知名學者如錢穆、唐君毅和左舜生等，也有投身出版、新聞行業的青年人如胡欣平和胡菊人。而「美元文化」對後者的影響很大。同時，筆者不能不提由美國國會眾議員周以德所創立的「援助中國知識人士協會」（Aid Refugee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c.）。此組織成立於一九五二年，創立目的是幫助逃離中國的知識分子到外國定居。它在香港設立了分社，並接受在港知識難民的申請，甄別他們的身份，讓他們有秩序地從香港移居臺灣、美國及其他國家（趙綺娜，1997：68-77）。移居美國者，例子有歷史學家余協中（余英時，2018：179）。及至一九六零年，共有七千八百零一名知識難民移居臺灣、七百三十六人移居美國和兩百九十三人移居東南亞（趙綺娜，1997：100）。與此同時，友聯出版社亦派遣部分編輯前往東南亞創立分社。余德寬、陳濯生和姚拓在一九五六年於新加坡出版了《學生周報》。該報在一九五九年遷至吉隆坡出版。作為新馬版《學生周報》總編輯的姚拓，最後更決定定居馬來西亞，發展其出版事

業 (Yung, 2019: 158–162)。余英時則參加了哈佛燕京學社的訪問學人計劃到了美國，其後更得到哈佛大學的獎學金攻讀歷史學博士學位 (余英時, 2018: 179–183)。現在余英時已經成為蜚聲國際的歷史學家。

除了「美元文化」的影響，也有知識難民憑自身才能闖出一片天。前民社黨員李微塵便是一例。李微塵於一九五零年代初暫居香港數年，期間任職新加坡《南洋商報》駐香港通訊員。一九五六年，《南洋商報》更聘請李微塵出任該報總編輯。李氏遂決定定居新加坡。此後，他不時評論當地的政治、社會和文化發展。一九六零年，他更被新加坡政府聘為文化部新聞組主任。其政治經歷及任職傳媒的經驗更使他獲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賞識。及至一九六五年，六十二歲的李微塵更獲邀出任李光耀的新聞秘書，負責協調李光耀與傳媒的關係 (Yung, 2019: 155–158)。李微塵可算是冷戰期間移居東南亞的中國知識分子當中事業較為成功的一位。

伍、結語：香港的自由社會對知識難民的意義

一九五零年代，港英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容許不同政治勢力的人士在香港活動，以維持其勢力平衡。南來香港的知識難民遂能自由地在香港辦學和辦報，使他們能在香港發展他們的事業和宣揚他們的政治理念。這在兩岸政權皆在專制統治的情況下，實屬難能可貴。香港相對自由的社會環境，亦改變了不同年齡層知識分子的生命軌跡。知名學者如錢穆和唐君毅等能自由地在香港做學術研究，青年人如胡欣平和胡菊人亦在香港開創了他們的文化事業。同時，香港作為中國與世界之間的橋樑，亦使不少流亡香港的知識難民以香港為跳板遷居外國，在當地發展他們的事業。在冷戰時期，香港作為大中華地區唯一享有自由的地區，不但保護了來自中國大陸不同階層的難民，使他們免受中共政權的逼害，更提供充足的機會予流亡香港的知識分子，讓他們在本地或外國闖出一片天。

參考書目

- 王梅香。2015。〈文學、權力與冷戰時期美國在臺港的文學宣傳（1950–1962年）〉。《臺灣社會學刊》57：1–51。
- 何卓恩。2008。《〈自由中國〉與台灣自由主義思潮：威權體制下的民主考驗》。臺北：水

牛出版社。

何俊仁，2010。《謙卑的奮鬥》。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

余英時。2018。《余英時回憶錄》。臺北市：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周愛靈。2010。《花果飄零：冷戰時期殖民地的新亞書院》。香港：商務印書館。

胡王篆雅編。2010。《司馬長風逝世卅周年紀念集》。香港：維邦文化企業公司。

容啟聰。2018。〈民主社會主義在冷戰香港：從理論闡述到參與本地政治〉。《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67：229-249。

張發奎口述、夏蓮瑛英文記錄。2008。《錄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鄭義譯。香港：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

傅葆石。2019a。〈文化冷戰在香港：《中國學生周報》與亞洲基金會，1950-1970（上）〉。《二十一世紀》173：47-62。

傅葆石。2019b。〈文化冷戰在香港：《中國學生周報》與亞洲基金會，1950-1970（下）〉。《二十一世紀》174：67-82。

黃克武。2020。《顧孟餘的清高：中國近代史的另一種可能》。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萬麗鵬。2001。〈一九五零年代的中國第三勢力運動〉。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

新亞校史館。2021。〈早期教師（1949-1976）〉。[http://history.na.cuhk.edu.hk/zh-hk/%E6%A6%82%E6%B3%81%E6%97%A9%E6%9C%9F%E6%95%99%E5%B8%AB\(1949-1976\).aspx](http://history.na.cuhk.edu.hk/zh-hk/%E6%A6%82%E6%B3%81%E6%97%A9%E6%9C%9F%E6%95%99%E5%B8%AB(1949-1976).aspx)。2021/04/14。

趙綺娜。1997。〈冷戰與難民援助：美國「援助中國知識人士協會」，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九年〉。《歐美研究》27(2)：65-108。

盧瑋鑾、熊志琴編。2014。《香港文化眾聲道 1》。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錢穆。1994。《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Yang Tianshi. 1992. "The Third Force in Hong Kong and North America During the 1950s." In Roger B. Jeans ed., *Roads Not Taken: The Struggle of Opposition Partie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269-273. New York: Routledge.

Yung, Kenneth Kai-chung. 2015. "Cold War Currents and Chinese Émigré Intellectuals, 1949-1960." *Twentieth-Century China* 40, 2 (May): 146-165.

Yung, Kenneth Kai-chung. 2019. "Diaspora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the Cold War Era: From Hong Kong to the Asia-Pacific Region, 1949-1969."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15, 2 (November): 145-170.

